

追懷張其昀先生（上）

蔣君章

噩耗突傳如同霹靂

張曉峯先生其陶突然與世長辭，噩耗突來，如聞霹靂，急忙與妻慰唁張師母，並擬在靈前行禮。我問師母說：「今年新春，我到榮總去賀年，他還微笑地執着我的手，認為復原有望，求生意志甚為堅強，怎麼會有如此迅速的變化？」師母說：「生機早已老化，前幾天麻木及於舌根，口齒不清楚。醫生要家人陪侍，認為時間不會拖得很久了。昨天晚上，鏡湖（先生惟一的兒子）本來要同我一起住在醫院，怕他太累，沒有要他同去。但半夜裏，看樣子不行了，我還是要他來，總算送到終了。」言下，唏噓不已。舊時子女對父母的孝，臨危必親侍在側。張先生伉儷家庭教育，還能貫徹到受國外教育的下一代，足為世人法。

張先生兄弟似乎還有一人，名其時，字雨峯。我在杭州見過，但未有往來。我知道張先生的名字甚早，但真正認識他，卻在民國十八、九年，是我在中央大學最後的一年。他是國立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畢業的。南高首任校長是江謙先

生，教務長是郭秉文先生。江氏辭職後，由郭繼任，而由劉伯明先生繼任教務長。這幾位先生都是切實辦事的人，禮聘名師，充實圖書儀器設備，不遺餘力。張先生進的文史地部，當時國文方面的教授如桐城姚永樸先生（姚姬傳先生的嫡系子孫），興化以辭賦著名的李詳審言先生，詩歌文兼擅的溧水王冬欽伯沅先生，詞曲名家吳縣吳梅霜匪先生，歷史方面最著名的如柳翼謀先生，氣象地理方面的開山大師竺可楨先生等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名教授。張先生學歷史，是柳先生的入室弟子，學地理是竺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真幸運，能親受這幾位名師指導。當我進東南大學時，柳先生還留有中國文化史講義，竺先生還留有地理學通論講義，都是鉛印的。我趕快去講義室搶購，這最後兩本總算被我得到，真是喜不自勝。

人文地理開山大師

張先生在學校讀書時，已有相當的知名度，當時大家知道他是學地理的。大家知道竺先生是國家第一位氣象學家，但他對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方面也有深刻的研究。他的地理學通論，和現在

注重自然地理的情形不同，他是由地理的自然現象分布帶解釋人文現象的分布帶，得出若干結論，作為兩者間關係之準則。此在當時的地理學者是聞所未聞的。竺先生可以說是第一個把西方的人文地理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張先生運用此等學理，來整理中國的地理資料，自成系統。因而，他的文章，不但是地理學者，就是一般知識分子，一經研讀，無不點頭叫好。這樣，便成就張先生在地理學方面的知名度。

他在南京畢業後，被商務印書館延攬以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附設的東方圖書館，是上海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被人視為知識的寶庫。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被日空軍焚毀，足證這裏藏了多少反日書籍，出版了多少反日書籍，致遭日人之忌。這一燒，我和陳叔諒先生合寫的世界殖民史稿也成灰燼了，不勝倒霉之至。

張先生在商務編譯所，撰寫了兩部劃時代的教科書：第一部是初中地理教科書，完全以人文地相關的觀念，灌輸給初中學生，說理深入而淺出，組織嚴密而不呆板，筆調輕鬆活潑，處處引人入勝，使未受人文地理教育的老師，也可勝任愉

快。當時行銷遐邇，洛陽紙貴，使地理學界開了

新境界，教師實得教學相長的效果，對地理教育，貢獻實大。第二部書是高中用的本國地理。這也是劃時代的創作。舊時的高中地理教科書，可以說是比較詳細的分類騰清賬。從位置、山脈、河流、物產、交通、都市等，一條一條的列出來，教學時最多只要查查地圖而已。當時的地圖，山脈都是一條一條的毛毛蟲，分不出高低寬狹，徒具形象。對氣候，更是毫無所知，事實上也沒有現成資料可資運用。張先生的高中本國地理，完全突破舊的窠臼，創自然區域說，分全國為二十三個地理區，其根據是地形、氣候、風土人情與資源分布等，那完全是新的地理教科書。當他編撰的時候，最大的困難，恐怕是氣候方面的資料。當時中央氣象研究所尚未成立（民國十五年北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始設氣象研究所於北極閣），只有外國教會或上海法租界法人所創的天文台之類極少地區和極短時間的部分記錄，絕對不敷應用。先生在無辦法中，參考古人詩文集中有關氣候的記述，如述海南島地理時，以蘇軾客居海南一詩中所說的「四時皆如夏，一雨便成秋」，作為熱帶氣候的特色。真是煞費苦心。當時這部書盛行於國內，大家叫好，大家採用；但是對人文地理缺少修養的教師，只有照書宣講，如授國文課本，成為當時的奇談。這部書在民國二十年後，重行寫過，由南京鍾山書局出版。雖然仍是二十三區，但是氣候、地形以及經濟資源等新資料都已收入，文筆更為流暢。我在杭州教書時始終採用這本教科書。內容過於豐富，故以

酌要討論為方法。

民國十六年，上半年東南大學停止開學，下半年復校，改稱第四中山大學（第一在廣州，第二在武漢，第三在杭州）。那時候試行大學區制，教育部改稱大學院，直屬國民政府，中山大學除辦理大學教育外兼管所在省的教育行政。復校之初，文學院獨立（原與理學院相合，稱文理學院），有國文、外國語文、史地等系。當時，我的志願是學法律，系主任是名法學家謝冠生先生，卒業後想當律師，為被侮辱的人打不平。因選謝先生主講的法理學。後來知道律師被當時社會人士看作特殊人物，心有不甘，於是改系，但不知如何抉擇。惟對謝先生法理學各派的内容與演變的講授，頗感興趣，乃入史地系。當時柳先生和竺先生均早已離校，據說系主任原定的是全國馳名的史學家象山陳漢章伯弢先生，惟尚未到校，地理方面只有請張先生回校任講師，歷史方面只有一位清華留學的雷海宗伯倫先生。我志在歷史，於是勉強選了二十四個學分，除史學課程外，還選了教育系的中學教育（那時候我想畢業後當中學教師）和社會系的社會變遷等課程。讀了一年歷史學後，發現與我的興趣也不相合。因為我已悟得歷史學是廣泛的綜合性學科，老師所講的中、西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近世史等，都是史事演變的事實，最多講點因果關係，往往是片段的，和整個歷史的演變，似乎銜接不起來，而且學了歷史，除了做歷史教師外，還能做什麼呢？但是我不能改系了，再改要留級，這是家庭經濟所不許可的。於是我做了新決定：其一，

歷史的舞台是地區，學史的人，應該懂得地理，因以地理為副系。當時地理已獨立成系，屬理學院。其二，歷史的推動力是人類生活奮鬥所累積的經驗，這種經驗，使生活改善，社會、經濟、政治進步。這些知識，史學系本身並不具備。因此，我決定在社會、經濟、政治等系選課，學分已足則去旁聽。

既然決定要以地理為副系，那就應該多選地理系的課。張先生以本國地理著稱於時，於是我選了他開的本國地理。系外選讀者甚多，教室在新落成的科學館樓下大會堂。我總是很早到教室，坐在比較前面的位置。張先生講課的特色，是沒有書本，不指定參考書，只掛張地圖，手裏只有兩支粉筆。他的講題非常活潑，不拘泥於地理的内容，而難以歷史和人物故事。如講四川的地理，他的題目是「自古詩人皆入蜀」，所講的是李白、杜甫、陸放翁的故事，由此，可以證明他準備的時間很充分，是史地兼治的學者。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上課的方式，無論在中學或大學，我在上課以前必作充分的準備。只拿粉筆，不攜任何夾帶。政大聽過我經濟地理的學生，直到現在，還不時有人問我：「當時老師黑板上的數目字，怎麼能記得如此清楚？」我的答覆：「此無他，多準備，多下分類強記工夫而已。」

在大學讀書時，我同張先生的關係，如此而已。他怎麼知道我的？我並不知道。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只求心得，不求知名度，頗受王伯沆先生的影響。王先生的詩文與書法，名滿天下，但他的作品，絕不讓人知道。他住高師教職員宿

舍，有一次寫好了兩首詩，沒有收好，因事離室，被一個來訪的學生所見，抄寄學術雜誌。先生見了，不高興。我曾選過他主講的杜少陵詩，他曾提及此事，還深露不愉之色。他幽默地說：作品常被入見，好比菜場上的菜，上市多了，反被人所厭。這正代表南高到中大的學生不歡喜出風頭的特殊風氣。不過，在初到台灣的時候，張先生向他的朋友介紹我時，常稱我是他在南京最早的學生。

一次最成功的演講

想不到我在畢業後担任中學教師，常常教地理課，有時候寫些不像樣的文章，也以地理方面為主，以致大家都以為我是學地理的。因為需要參考資料，常常和母系發生往來。地理在中大初期與歷史相合為一系，分出去後與地質合稱為地理系，仍不免有寄人籬下之感，於是再分出來，始稱地理系，由胡煥庸先生任主任。初期包括氣象在內，氣象也成系後始為純粹的地理系，那大概是十八年以後的事了。當時我加入中國地理學會為會員，會中出版學術性的季刊，地理系也出版地理教育月刊，皆由胡主任主辦，因此我與胡主任函件往還較多，胡主任也不厭其煩的有問必答，有新資料甚至國外的新書，必贈我一份，或舉以相告，態度謙誠，令人容易接近。在這一段期間，我和張先生沒有什麼往來。

及浙江大學校長由竺可楨出任，任張先生為史地系主任。在其初來接事，隻身在杭時，我曾往他的單人宿舍探望，陪侍的有李玉林同學（字

海晨，不久留德）。先生問我工作情形，我以包辦杭女中全校地理為答。他帶着稱讚的口氣：「聽說你書講得很好。」我也謙遜一番。他又問我，對淪陷後的東北，有研究興趣否？我說：「頗有興趣，我現正準備研究國防地理，甚需該方面的資料。」他把英文「滿洲國」年鑑交給我，囑我擇要翻譯後，把譯稿交給他。我很細心的看了緒論和目錄，選擇要翻譯的部分，費了一個暑假和一年課餘和晚上的時間，不辱使命的交了卷，可是再也沒有下文了。時上海世界書局託人請我編一套新課程標準的世界地理，我接了下來；那時候的杭州，可以說是半沙漠文化，東南日報為了提倡學術研究，聘老同學陳豪楚先生（經濟系畢業），編一個叫做學苑的學術性三日刊，經常稿荒，告急於我，不能予以支持，因此很少去看先生。不過，每當浙大史地系將畢業的學生，作畢業參觀時，常由顧毅宜教授率領，只要一到杭女中，便緊跟着我轉教室旁聽，有時候還問東問西，好像是冲着我不來的，這大概是由於張先生的關照吧。那時候的杭州中等學校，有一種請人演講的風氣。英文方面已請林友蘭先生講過一次，很受學生歡迎。孫校長希望我請張先生也講一次，我沒有把握，答覆：「試試看」。我把此意以最誠懇的態度轉達了。張先生消息很靈通，知道林先生演講的事，謙辭不允。我說：先生有一個取巧而極有效果的方法，可以偏鋒取勝。杭女中有一部幻燈機，您可以把考察西北的幻燈片帶去，我放幻燈片，您報告考察經過及解釋幻燈片的實況。既不需要準備，也可使學生聞所未聞，一定大

受歡迎。您去演講，等於支持我，否則我將無以向學校當局交待了。先生已久享盛名，一入大會堂，學生全體肅立，校長簡報先生講演內容後，我開始放幻燈片，先生亦開始演講，妙語如珠，時有通俗性的幽默語。全堂學生時起轟動的掌聲，有時歷久不絕，先生只好等掌聲過去再說。一個多小時瞬息過去，全無冷場和喧吵之聲。這是一次最成功的演講。先生甚為愉快，孫先生對先生和我都非常感激。這是先生在杭州幫我最大的一次忙。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繼之以八一三上海事變，我最高當局不得不發動全面抗戰。杭州的學校都疏散到鄉區，浙大首先遷往建德（嚴州），杭女中與杭一中（校長是夫婦檔，時人稱為夫婦學校）遷往桐廬的俞趙村。十一月，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杭州灣的全公亭，桐廬震動，乃再西遷至浙江最西的縣——淳安縣。我們的船夜宿嚴州，我上岸探望先生和另一竺氏門下的沈魯珍先生（時任總務長）。先生很關切的問我：「作何打算？」我說：「學校尚未停辦，暫時沒有問題。將來如有困難，請先生支援。」先生以「當然」為答，我頗感激，先生則以浙大將遷江西吉安相告。無何，學校解散，我與同事及學生數人西避長沙，逗留經月。聞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武漢集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設置國民參政會、三民主義青年團。政府將設經濟部，由翁文灝任部長。我知道先生與翁有交往，馳函吉安，請向翁氏介紹。戰時慌亂，以快函發出，但迄無覆書。函或遺失，或先生函翁而未獲答覆，皆有可能。好在，不久由同學邵君之介紹而入政治部第一

廳工作。該方面有無消息？在所不計。這是我轉任公務員的開始。時各方面拉攏知識分子甚力，中共和閻錫山在武漢均有辦事處，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以我曾著「新疆經營論」，介紹我赴新疆，隨杜重遠。但我是國民黨員，只有苦候第一聽的機會。經一個多月，滿身都是臭蟲傷痕，原來我住的是「候補街」，接獲政治部命令後，始租屋於王臣街，是杭女中同學兼同事王女士的家，正好有一個房客搬出，我就候補着這間房子，一時成了同鄉與同學的聚居所。時政治部第一廳在蛇山湖南會館辦公，距寓所不到十分鐘的行程，真是巧極。

「思想與時代」的橋梁

浙大遷校歷程，甚為曲折。自建德而吉安，而宜山，而邊義。吉安以西，陸路居多，真可說艱苦備嘗，但重要設備，並未遺失，真是難得。至邊義始告安定（一度也曾驚慌過）。而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先生逝世，由先生接長文學院，仍兼史地系及研究所。時柳翼謀先生、錢賓四先生和張蔭麟先生等均在教授課。先生高足任君留英回國，教師陣容頗為堅強。先生乃創辦「思想與時代」月刊，繼學術之後，宣揚固有文化與人文思想。先生與柳先生亦時來重慶，我們頗有相見的機會。那時候陳叔諒先生也到了重慶，在侍二處工作，我因叔諒師之介，在陳布公（布雷先生）辦公室主辦搜集資料與酌量呈閱文件以及提供參考資料等工作。「思想與時代」得呈供最高當局參閱，就是這種關係，最高當局之重視先生，大概也

始於此時。奉派至美國研究，亦與此種情形有關，固不僅因寧波同鄉之故。先生在赴美之前，曾至中央訓練團受訓，在這段期間，我們見面機會較多，但是並沒有什麼深入的談話。那時候在侍從室工作的人，嚴禁與外人接觸，以防洩漏機密，我們都信守這個限制，甚至對方來做些什麼，也避免問及，藉免無意中露出口風。先生回國後，曾回浙大任教，復員時仍回杭州，我們則同南京。我仍留在陳布公辦公室工作。那時候工作同仁極少，協助辦公的只有我一個人，工作極為繁瑣而零星。我在勝利後的三年中，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文章，因此對先生也沒有問候。

三次接觸印象深刻

但與先生有三次印象極為深刻的會見。一次是在南京，一次是在杭州，一次是在廣州。在南京會見的那次，是在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竺校長和先生同到南京。竺校長先到湖南路，由我先行接見。我問竺校長對時局的看法，他說：「國民黨辦不好，讓中共試試也好。」那時，中立派學者，對共黨無認識，不知道這是試不得的。政治制度不是理化實驗，壞了可以再來，政治若然，必致大亂。陳布公下樓，我便退出。他們談些什麼？我不知道。但布公因知張先生也在南京，要我找他。我找到了，不敢和他談什麼，恐怕也是竺的論調，那我就有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窘態了。所以我引進客廳後，即上樓請布公。他們談些什麼？我也不知道。但布公送客，通常都送到客廳門口，此次立即上樓，足證所談不治，我只好代送。

在杭州那一次的見面，是在送布公靈柩至杭州的寧波會館暫厝。那時候徐蚌會戰新挫，又遭布公逝世的大刺激，心痛欲絕，思緒紊亂。我在杭州住過七年，熟友極多，西湖勝地亦已十多年，但我都絕無訪問觀賞的興趣，一個人悶坐在房中發呆。有時候看看杭州報導有關布公的消息，對於將「三秘書」並稱而以我為首的記載，頗感不安，但亦無更正的想法。忽有敲門聲，啟視，則張先生也。我是行客，他是老師，應該我去看他，因此窘態畢露。他坐下來，第一句話就說，杭州學生都謂布公之逝，是怕將來被清丈鬥爭。我立刻嚴正的說：「這是左傾學生糟塌布公的特製謠言；也有人說這是『屍諫』，也是絕對不實的臆測之辭。他完全是因為時局日急，他的責任愈重，精力卻萬萬配合不上；而總裁則仍以一健康人看他，這樣交給給他，那樣交給給他，而且要得很急。如布公已感不支而又要他擬總動員法與節約運動推行法等，而且一日數催。他是恐怕就誤公事而輕生的，先生不可輕信謠言。」我乘勢問他：「政府正辦理疏散和南遷，浙大和先生有無計畫？」他沒有答覆。這一次的會談，並不愉快。

布公在九溪的墓地告成而安葬，我們再去杭州，我只是看過女中舊同事蔣伯潛先生。我的老同學在浙大教書而他的太太又是我杭女中的高足，堅持要我在他家晚餐，我的條件是：菜要簡單，客人要少，我不預備見很多故人。席間只有一位地理系老同學嚴德一先生。這次我沒有去看張先生，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的共同意見可磋商。（下期續完）